

# 《订鬼》和王充的无神论思想

徐安怀

《订鬼》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（公元27年—约100年）反对鬼神迷信，宣传无神论思想的一篇重要论文，列为《论衡》第六十五篇，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只是该文的第一段。这段文字可分为四个层次：

第一层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，即“凡天地之间有鬼，非人死精神为之也，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。”这里特别要注意“思念存想之所致”这几个字。什么叫“思念存想”？它指的是想不开、入了迷形成了的某种观念，有点近乎“心中有鬼”的意思。所谓“致”，作导致、造成讲。这几个字是全文的论证中心。“致之何由”以下摆出理由，从疾病、忧惧、见鬼三者因果关系的简单推论中，说明了“鬼”来源于病态的心理活动，对中心论点作了初步论证。最后以“何以效之”承上启下，转入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具体论述。

第二层，引用《吕氏春秋·精通》的记载。但这里引用的不是原文，只是大意。原文是：“伯乐学相马，所见无非马者，诚乎马也。宋之庖丁好解牛，所见无非死牛者，三年而不见生牛，用刀十九年，刃若新研斲，顺其理，诚乎牛也。”作者由伯乐、庖丁的用心入迷，心中只有马、牛，因而“自见异物”，把相异的东西看成他心中想的东西的这种现象，加以类推，说明“人病见鬼，犹伯乐之见马，庖丁之见牛也”，完全是心理作用。

第三层承第一层“由于疾病”进行深入分析，根据生活经验，列举出病人所以会产生鬼的幻象的种种缘由，论证了所谓见“鬼”确实是病人“存想虚致”、心中有鬼造成的错觉。作者通过以上具体论述，进一步说明了“鬼”是“人思念存想之所致”这个中心。

第四层是结论。根据文章开头的论点，再一次列举“精念存想”产生的幻觉并进行归纳，强调指出：鬼并非客观存在，见鬼不过是由于恐惧所产生的一种精神病态。照应了开头，总结了全文，使得文章一气呵成，结构严密完整。同时，由于围绕中心逐层、反复地论证，也使得文章论点鲜明，确凿可信，有较强的说服力。

这段文章，王充主要是论证了中心论点的后半部分，即人们思想中的“鬼”是怎样形成的。至于前半部分“凡天地之间有鬼，非人死精神为之也”，则没有作具体论述，这是因为作者在《论衡》第六十二篇《论死》中，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在这篇文章中，王充吸取了战国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关于“天人相分”，“形具而神生”（《荀子·

天论》)的观点,总结了东汉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桓谭“以烛火喻形神”(《新论·形神》)反对讖纬神学和鬼论的论述,并利用了当时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成果,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精神和形体的关系。他认为,精神(有时又称为精气)是存在于人的形体中的使人赖以生存的一种力量,“人之所以生者,精气也,死而精气灭;能为精气者,血脉也;人死而血脉竭,竭而精气灭,灭而形体朽,朽而成灰土,何用为鬼?”他还用火和烛的关系来作比喻,认为“人之死,犹火之灭也。火灭而光不耀,人死而知不惠,二者宜同一实。”如果说人死了之后变成鬼,还能有知觉,“是谓火灭复有光也”。虽然王充用“精气”来解释人的精神现象并不科学,但他承认形体的第一性,精神必须依赖形体而存在,则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说明形体与精神的关系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这已经是很高明的看法了。正因为如此,《订鬼》就直接援引了《论死》的这一结论,把问题转到对鬼的观念产生根源的探索上去,使批判从理论上更深入了一步。

王充的探索是在前人已有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。鬼是“思念存想之所致”这个命题的提出,就是对前人这方面的思想的总结。在先秦时期,荀况就曾从认识论的角度探求过引起鬼神观念的原因。他说:“凡人之有鬼也,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正之(是因为他处在神情恍惚迷惑不解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),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(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把有当作无,把无看成有的原因)”(《荀子·解蔽》)。荀子认为,有人以为看到了鬼神,其实是错觉造成的假象。稍后一些的韩非,也进行过类似的探索。韩非在解释《老子》中的“以道莅天下,其鬼不神”的话时,就这样说过:“人处疾则贵医,有祸则畏鬼。圣人在上则民少欲,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,举动理而少祸害。夫内无瘞、疽、癰、痔之害,而外无刑罚、法诛之祸者,其轻恬鬼也甚。”(《韩非子·解老》)他认为迷信鬼神的思想是由于遭遇疾病和祸害而产生的,如果没有疾病和灾祸,对于鬼神也就淡薄看轻了。这些观点,很显然王充在《订鬼》中是吸收了的。所不同的是,无论荀况还是韩非,都只是一些零星的观点,而王充却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无神论思想体系。

王充的无神论思想,是他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在他那部用了三十多年工夫写成的哲学巨著《论衡》的八十五篇(其中《招致》只存篇目)文章中,批驳鬼神的占了相当部分。作者自己公开声明,他写《论衡》的目的是为了“就世俗之书,订其真伪,辩其实虚。”(《论衡·对作》)在《谈天》、《谴告》和《自然》等篇中,作者无情地揭露了“天人感应”的宗教神秘主义,捍卫和发展了古代的唯物论。他说:“天地,含气之自然也。”(《谈天》),提出了“气”(即“元气”)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的物质基础的著名论断,并认为“天地合气,万物自生,犹夫妇合气,子自生矣”(《自然》),万物的产生在于物质“元气”的运动,不存在所谓有意志的创造者的“天”。所谓灾异只是“元气”变化的结果,与人事无关,“夫天道,自然也,无为;如谴告人,是有为,非自然也”(《谴告》)。这种给自然、生命现象以唯物主义解释的观点,对于反对上帝创造天地和灵魂不死的宗教迷信,有着重要的意义,它是王充无神论思想的理论基础。在《书虚》《变虚》等九篇专门揭露“王权神授”、龙神雷公、善恶有报、

学道升仙的虚妄怪诞的文章中，王充对当时流行的所谓“鬼神治阴，王者治阳。阴过（罪过）暗昧，故使鬼神主之”的观念也进行了严肃的批判。他指出，世俗所说的“雷为天怒”，“天用雷杀人”，完全是“无有而空生其言”，根源在于“虚妄之俗，好造怪异”；而事实是“雷者火也”，天上并无“雷公”，雷也不能惩恶劝善（见《雷虚》）。在《薄葬》篇中，王充通过对“尚厚葬”，“破家尽业以充死棺，杀人以殉葬，以快生意（使活人快意）”的腐败风气的揭露，在抨击“圣人惧开不孝之源，故不明死无知之实”的恶劣行径的同时，批判了“鬼是死人”的论调。但这些论述还是比较分散的，而比较集中、全面地阐述王充无神论思想的，则是《论衡》中的《论死》、《死伪》和《订鬼》三篇。这三篇评论鬼神问题的专论，连同《论衡》中其他一些观点，全面地、系统地阐述了王充的无神论思想，表现了王充的科学态度和唯物论者的战斗精神。虽然王充论鬼的目的，是为了“使俗薄丧葬”，“冀悟迷惑之心，使知虚实之分。实虚之分定，而华伪之文灭。华伪之文灭，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”（《对作》），是希望改革当时的社会风尚。但其客观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他的主观意图。它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，也触动了神权的根基，在政治上、哲学思想上都起了巨大的作用。南北朝时期的战斗无神论者范缜，不论在理论上、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、在形神关系的基本论点上，都是王充学说的直接继承者。范缜以后，张载、王夫之、戴震等人，也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发扬了他的无神论学说。

如上所述，《订鬼》的中心论点是：“凡天地之间有鬼，非人死精神为之也，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。”这是一个杰出的命题。因为在王充的时代关于精神不死、灵魂不灭、人死为鬼的观念可说是源远流长，根深蒂固，“凡天地之间有鬼”，就极其概括地说明了这种情况。相传为周文王所作的《周易》中，就已经有“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”（《周易·观卦象辞》）的话。这就说明，用鬼神来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，早已成为剥削阶级的信条。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中的一段记载，很能说明其中的奥秘。它说：统治者利用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认识不清或不够理解，如“怯者夜见立表（树立的标志）以为鬼也，见寝石（卧着的石块）以为虎也”等等，就“因鬼神祝祥（迷信）而为之立禁”。它认为，社会上流传的用刀相戏，祖宗就会拉住他们的手臂；枕门槛睡觉，鬼神就要踩他们的头等说法，实际上不过是因为用刀相戏是危险的，枕门槛睡觉会受风寒得病，“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。凡此之属，皆不可胜著于书策竹帛而藏于官府者也，故以祝祥明之。为愚者之不知其害，乃借鬼神之威，以声其教。所由来者远矣。”因为这种愚弄由来已久，因而一些思想家也深受其毒。比如战国时期的进步思想家墨翟就相信有鬼。在《墨子》中，他就曾这样反驳无鬼论者说：你们说无鬼，为什么不到一乡一里去访问访问呢？“自古以及今，生民以来者，亦有尝见鬼神之物，闻鬼神之声，则鬼神何谓无乎？”（《墨子·明鬼》下）这种鬼神迷信的思想，到了西汉末东汉时期，则成为由官方公开提倡的“谶纬之学”，既见诸记载，又被藏于官府，成了一种专门的“学问”。所谓“谶”，又叫谶记，是假托神的启示用隐语的形式来预知吉凶的一种宗教预言；“纬”，又叫纬书，是把帝王圣人神化，用宗教迷信来解释儒家经典的一种著作。这种“谶纬之学”的核心是鼓吹“天人感应”，“王权神授”，因此在公元79年东汉章帝亲

（下转81页）

切，有着极大的艺术感染力。在刻划工人群众的形象时，只在全诗开头用两行诗作传神的肖象描写，其余全部通过西利西亚纺织工人的语言来刻划。由于语言简练、生动、有力，形象也便十分鲜明，感人至深。

诗的结构极其严谨，形式非常整齐，首尾两节呼应，每节最后一行重复，具有民歌的风格。沉郁的格调，铿锵的音节，反复吟唱，回肠荡气，与工人们每天坐在织机旁所从事的繁重而无休止的劳动，与工人们郁集在胸中的深沉而强烈的阶级仇恨，形成了和谐的统一。

---

（上接75页）

自主持的白虎观全国经学讨论会上受到肯定，成为官方法典。求神问卜，学道成仙，迷信鬼神之风因之泛滥成灾。就在这种鬼神笼罩社会一切角落的情况下，王充置流俗于不顾，敢于站出来否定鬼神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当统治阶级兴妖作怪，要人民听命鬼神的时候，王充写下这样的文章，可以说是黑夜里发射出的人民智慧之光的明灯。

《订鬼》的思想是可贵的。不过，我们也应该看到王充的无神论思想也是有局限的。他仅仅从人的生理现象、主观感觉去论证鬼神的虚妄不实，这显然是片面的。因为鬼神观念的产生当然有认识上的根源，但进入阶级社会以后，作为剥削阶级维持其统治的精神支柱之一的鬼神迷信，则更有着阶级的原因。此外，王充对鬼神的反对也是不彻底的。他甚至还认为“世间所谓妖祥，所谓鬼神者，皆太阳之气为之也”（《订鬼》），又陷入了神秘主义。同时，他还主张命定论，认为“自王公逮庶人，圣贤及下愚，凡有首目之类，含血之属，莫不有命。命当贫贱，虽富贵之，犹涉祸患矣；命当富贵，虽贫贱之，犹逢福善矣。故命贵，从贱地自达；命贱，从高位自危。故夫富贵若有神助，贫贱若有鬼祸”（《论衡·命禄》），依然没有摆脱唯心论。由此可见，王充对鬼神的否定，还只是力图根据自然现象、生理条件以说明某些社会现象，是从社会外部去找原因，而对复杂的社会现象，就没有能力作出科学的解释。这是历史的局限，是应该加以说明而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。

《订鬼》写成距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。今天，科学的发展，社会的进步，已经彻底揭开了鬼神之谜，但是，现实生活中却还存在着传说中那样的“鬼”人和“鬼”事；同时也有一些人由于身染“疾病”（如思想上出了毛病），“人病则忧惧，忧惧见鬼出”，心中有鬼，怕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读一读这篇历史上反对有鬼论的著名论文，应该是很有教益的。